

陈述●主编

256944



遼金史論集

第二輯



256944

11.3(1)-175



辽金史论集（第二辑）

陈 述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涿州市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 册

统一书号：11201·76 定价：3.05元

目 录

- 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 杨树森 王承礼 (1)
辽代 (契丹) 刑法史论证 陈 述 (14)
萧绰评述 尹承琳 许晓秋 (52)
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 邹逸麟 (69)
辽泽州、陷河及陷河银冶考 承德地区文化局调查组 (85)
辽双州城考 李仲元 (96)
辽上京附近水道辨误
 ——兼考金上京之曲江县故址 冯永谦 (105)
朔县辽杭芳园栖灵寺碑考 张畅耕 (120)
契丹与阴山
 ——读史札记 杜承武 (132)
古典通俗文学中的辽朝 舒 焚 (148)
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 郑恩淮 (165)
辽代佛学著译考 朱子方 (175)
辽金时代室韦的变迁 冯继钦 (199)
女真人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演变 王可宾 (211)
论金熙宗时期国家政体的转变 赵冬晖 (226)
“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建立及其研究 王仁富 (245)
完颜亮小议 罗继祖 (256)
金世宗与“隆兴和议” 王宏志 (262)
金代东北的交通路线 李健才 (278)
关于金代曷懒路的几个问题 王崇时 (303)
金代交钞浅议 王德厚 (316)
《元史·太祖纪》所记蒙、金战事笺证稿 余大钧 (329)

COLLECTED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NO. 2)

Contents

Yang Shusen and Wang Chengli: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iao Dynasty.....	(1)
Chen Shu:	
A Proof of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Qidan) 's Criminal Law.....	(14)
Yin Chenglin and Xu Xiaoqiu:	
A Commentary on Xiao Chuo.....	(52)
Zou Yilin: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Xi- liao (Karakhitai) River Basin During the Liao Period	(69)
The Study Group of the Bureau of Culture in Chengde Area:	
A Study of Liao's Zezhou and Xianhe, and Xianhe's Metallurgy of Silver.....	(85)
Li Zhongyuan:	
A Textual Research in Liao's City of Shuangzhou	(96)
Feng Yongqian:	
Amendment to the Sketch of the Water- ways near Shangjing of the Liao Dynasty	(105)

- Zhang Changgeng:
A Study of the Liao Dynasty Stele in
Qiling Temple at Hangfang Garden, Sh-
uoxian County (120)
- Du Chengwu:
Reading Notes on Qidan and Yinshan..... (132)
- Shu Fen:
The Liao Dynasty in Ancient Popular
Literature (148)
- Zheng Enhuai:
A Book Entitled *Qidan Cang* (collections)
Found in the Wooden Pagoda in Yingxian
County (165)
- Zhu Zifang:
Notes on the Liao Dynasty Buddh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175)
- Feng Jiqin:
The Changes of the Shiwei Nationality
During the Liao and Jin Periods..... (199)
- Wang Kebin:
Nuzhen's Evolution from Blood Rela-
tionship to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211)
- Zhao Donghui:
Changes in Jin's Form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Reign of Xizong..... (226)
- Wang Renfu:
The Founding of the Stele Inscribed "Da

Jin De Sheng Tuo Song"and Its Research.....	(245)
Luo Jizu:	
Notes on Emperor Wan Yan Liang	(256)
Wang Hongzhi:	
Emperor Shizong of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Long Xing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Southern Song and Jin)	(262)
Li Jiancai:	
The Communication Route in the Northeast Jin...	(278)
Wang Chongshi:	
Some Problems Related to Helanlu of the Jin Dynasty.....	(303)
Wang Dehou: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Jiao Chao, Paper Money of the Jin Period.....	(316)
Yu Dajun:	
Comments on the Records of the Warfare Between Mongolia and Nuzhen as Reflected in the <i>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 On Emperor Tai Zu</i>	(329)

辽朝的历史作用初论

杨树森 王承礼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是一个历史悠久、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光辉贡献的民族。辽朝是祖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朝代，尽管以阿保机为首的契丹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曾经给当时各族人民带来过沉重的负担和灾难，但更重要的却是促进了汉族和契丹境内各族的融合和统一，发展了祖国的历史。乃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沟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影响。

上述辽朝历史的成就与地位，从文献资料、民族学资料，尤其是从考古学的资料上看，都有充足的根据。但是长期以来，有些学术界人士往往受到大汉族思想的影响或囿于传统的史学偏见，有意无意地贬低辽金在祖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辽金文化落后，破坏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因此，本文试就辽朝的历史作用，进行初步探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辽朝建立和北方第一次统一

辽是契丹族以耶律氏贵族为首所建立的王朝。契丹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源出于鲜卑宇文部的别支，活动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一带。至少从北魏起，契丹族就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加强了政治、经济联系。到了唐朝，这种关系更加密切了。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藩镇割据，战争连绵，河北一带的汉人

为了逃避战乱，多流入契丹境内谋生。与此同时，契丹贵族也乘机到中原掠夺财物和人口。在流入契丹的汉人中，也有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韩延徽、康默记、韩知古等人，他们都成为契丹的谋士，对契丹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史称：“(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①在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影响下，契丹迭刺部发展迅速，其首领耶律阿保机先后统一了契丹各部。唐天祐四年（907），阿保机代遥辇氏自立，后梁贞明二年（916），建立政权，国号大契丹，后改称辽。

辽朝的建立，是契丹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契丹社会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给予重大影响，这就是实现了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统一。

辽朝建立前后，阿保机在统一契丹各部的同时，还率领契丹骑兵对周边各族进行武力征讨，先后统一了室韦、吐谷浑、于厥、奚、党项、烈、阻卜、斡离改等部族，铁骊、靺鞨等部也降服于契丹。阿保机晚年，还灭了渤海。到辽太宗时，又并入燕云十六州，辽朝的统治区扩大到长城以南。辽圣宗以后，又开疆拓土，版图进一步扩大。《辽史·地理志》说：“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原在辽阳）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中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辽朝全境共辖“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③辽朝极盛时的版图：北至色楞格河流域，南至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至阿尔泰山以西，东临大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其所辖面积，相当于两个北宋。我国北方和东北的疆域，虽然早在汉代已奠定了基础，但是，将北方如此广阔的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直接管辖之下，辽朝是第一次，这

是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

二、巩固统一和“因俗而治”的政策

辽朝不仅统一了广大北方地区，而且还设官置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辽朝为了巩固统一，在地方上的行政设施，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完备。辽以五京分全境为五个大行政区（道）。辽代的地方机构，实行的是州县制和部族制相结合的制度。州县制主要实行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部族制主要实行于经济文化发展较落后的地区。辽制，州设刺史，县置县令。但又为制不一，有节度使州，有观察使州，还有防御、团练使州。故《辽史·百官志》说：“至辽，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余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④ 部族制主要是为契丹族和其他游牧、狩猎的部族制定的。部族制在设官置府上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把分布于内地的各部族，及地处边远的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一带的五国部，按部各置节度使统辖。这类部族在辽代有四十九个，共置四十九个部族节度使。另一类是把分布于辽境边远地区的部族，在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分别设置本部族的大王府，王府自行管辖，但也有因特殊需要增置节度使等管辖的。这类部族在辽代为数也很多，其中如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谦河流域的辖戛斯部则置辖戛斯王府，分布于贝加尔湖以东的斡朗改部则置斡朗改王府，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的阻卜各部则置各阻卜大王府，分布在嫩江上游及外兴安岭以南的室韦部则置室韦王府，等等。《辽史》上所说的属国六十，大多数是指的这类部族，他们都以其所产，纳贡于辽廷，受辽朝政

府的管辖。

辽朝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对各族的控制，还在各地区设有不同级别的军事机构。举其要者，如在上京道设有西北路招讨司、乌古敌烈统军司、阻卜都部署司等；在西京道设有西南路招讨司、倒塌岭节度使司等；在东京道设有东北路都统军使司、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咸州路兵马详隐司、女直兵马司等。为了加强边防，辽朝还在边防要地修筑了不少边防城，驻兵守御。如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筑靖边城（满州里附近），常置兵千余骑。在胪朐河（克鲁伦河）下游筑河董城（今乔巴山西），驻军防守。在胪朐河中上游筑皮被河城（今温都尔罕附近），常驻军五百。镇州城（今乌兰巴托以西），是辽北方军事重镇，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建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屯田驻守，“凡有征讨，不得抽移”。^⑤此外，还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阿姆贡河）口附近的特林地区，修筑了奴儿干城，^⑥加强了对黑龙江下游的控制。

以上史实表明，辽对北方地区的统一和管理，为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以前汉、唐统一王朝所没有做到的历史贡献。

第一，在辽朝以前，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时服时叛。汉、唐，尤其是唐朝，虽然也在北方和东北的一些地区，设置过州府，但大多是羁縻府州。辽朝通过军事征服，先后把分散的北方各族，置于它的直接统治之下，通过设官置府，派遣官吏，大大加强了对北方各族的直接统治，巩固了统一，并且为以后元代全国性的多民族国家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因此，辽朝对中国北方和东北疆域的稳定，起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第二，辽代的五京，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都是陪都。在四个陪都中，南京（也称燕京）的规模最大，人口最多，也是当时

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就是从辽代起，这个古老的蓟城，由北方的一个军事重镇，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第三，辽朝为了稳定在北方的统治，还实行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建立北南两面官制。这个制度，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特别是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在辽朝辖区之内，除了契丹人、汉人、渤海人之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有的经营农业，有的过着游牧或狩猎的生活，因此在辽朝境内便形成多种经济结构。当时的契丹社会，虽然已经存在封建制的成分，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奴隶制，这就不可避免的要与封建制生产方式为主的南部地区形成尖锐的矛盾。在生活习惯上，南北地区也不一样。南部的汉人，是“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北部的契丹和其他游牧各族，过的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⑦面对这种现实，辽太宗为了巩固统治，适应南北地区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民族构成的不同，采用了“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对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不同体系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辽史·百官志》所说的：“至于太宗，兼制中国（中原），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北面官是“治官帐、部族、属国之政”，官吏一律任用契丹人，这是辽朝的最高权力机关。北面官虽然是为了统治北方各族所设的一种特殊的制度，但从所属机构来看，也采用了唐制的内容。《百官志》序说：“凡辽（北面）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因此，北面官虽无六部之名，却有六部

之实。南面官是“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⑧ 主要沿袭唐制，中央设枢密院和三省、六部等职，地方设刺史和县令，官员多用汉人（也有用契丹人的），其权力远不及北面官之大。

辽朝所实行的这种“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适应了南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对各族区别对待，不改变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当时有两点积极作用：

其一，从以汉族为主的南部农业地区来说，使他们仍然按照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进行生产，过着农耕的生活。这就使南部地区保持了原有的封建秩序，在客观上也使辽境的生产力有所发展。契丹统治者之所以实行这种措施，也是形势使然，因为：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⑨ 契丹统治者也不可能改变这一规律；另一方面，在辽太宗灭晋的过程中，曾遭到中原人民的强烈反抗，正是由于人民的反抗斗争，抵制了契丹的奴隶制在汉区的推行。因而就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稳定了契丹的统治。宋人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述了辽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农、工、商业繁盛的情景，他说：析津府“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鸡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⑩ 事实上，燕云及原渤海地区，不仅是辽朝的经济重心，也是其财赋的主要来源地，^⑪ 辽朝存在长达二百余年，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它长期存在的物质基础。

其二，从契丹及其他各族居住的北部地区来看，允许他们保留原有的游牧狩猎的生活习惯，也有利于各少数民族生活的稳定。尤其重要的是，“因俗而治”的政策，还有利于各族的共同

提高。因为辽朝政治上的统一，使汉族和各族之间的联系密切，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影响下，北方的社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制因素的增长，契丹就出现了圣宗时期的封建化改革，缩小了辽朝境内南北社会之间的差距，从而使辽朝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契丹族是一个好学的民族，他们善于吸收汉族文明，因此，不到一个世纪，就使原来处于落后阶段的北方，迅速地向封建制转化，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历史证明，“因俗而治”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这个政策是辽朝对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对以后的金、元、清各朝的统治都有深远影响，是辽朝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

三、开发北方和东北地区

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大规模的开发，是从辽代开始的，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一) 在北方草原首次修筑都城和普建州县城市：辽朝以前，在我国北方草原上，城市非常罕见。辽朝建立后，神册三年(918)，始建皇都，负责营建的是蓟州人康默记。辽太宗进一步扩大，改皇都为上京。上京“依汉制”而建，幅员二十里，分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南城是汉城。汉城“南有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②是汉人居住的商业区。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又在草原上修建了陪都中京城。中京的营建是“择良工于幽蓟”，^③也是仿拟汉区的都城制度。中京“幅员三十里…自朱夏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廛肆庑下。”^④由此可见，上京和中京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草原上新兴的工商业大都市。

除了大都市外，辽朝还在草原上建置了大量的州、县城邑。据《辽史·地理志》所载，当时上京道辖州三十二、县三十，中京道辖州二十二、县二十九，西京道辖州十七、县三十五。^⑯这些州县城市，不仅有文献可证，今天在各地发掘和发现的不少辽代城址，也是历史的见证。辽朝在草原上修建的都城和大批的城市，是中国北部草原历史上空前的创举。

（二）汉人大量北移及北方、东北农田的开垦：魏晋以来，虽有不少汉人流入北方，但不深入。自辽代开始，大量的汉人才移入了北方和东北地区，既深又广。如上京道是民族杂居的地区，除契丹人以外，汉人和渤海人居多，其中的临潢府则是“并、汾、幽、蓟之人尤多”。^⑰中京道原为奚族等聚居区，建置中京后实以汉户，形成“数州千里之地”，“汉民杂居者半”。^⑱东京道原为渤海等族聚居区，而“汉民更居者众”。^⑲据《辽史》所记和已发现的许多辽代碑刻证明，在上京、中京、东京三道中，有汉人所居和杂居的州、县，就有五十多个。其分布范围，西北到鄂尔浑河流域，东北到嫩江下游。这些足以说明，在辽代，汉人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分布之广泛和人口之众多。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对这些地区的农田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并对当地其他各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辽朝建立以后，辽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⑳此后随着移民政策的推行，在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影响下，契丹、奚等族越来越多地熟悉了农业生产，他们在草原上，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既经营牧业又从事农业，实现了农牧业的结合。中京道是典型的半牧半农地区，开泰元年（1012），宋朝王曾使辽后说：“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㉑到以后苏颂使辽时，所看到的中京地区则是一派农田与牧地交错的景象：“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以谷量”；

“居人处处营耕牧，尽室穹车往复还”。^② 上京道的临潢府，也是“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②农、牧业相结合。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契丹品部、突吕不部、楮特部等部落，也是既治公田，又从事畜牧业。耶律昭说：“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察，一夫治公田，二夫给辽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畜牧之事，仰给妻孥。”^③ 辽朝在北方草原的许多地方，实现了农牧业的结合，这在历史上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创举。

东北的辽海地区，在圣宗时期就已出现了“编民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繁荣景象。^④ 更北的海拉尔一带，早在会同二年（939），辽廷就下诏“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欧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今喀尔喀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董突吕（即欧昆）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种”。^⑤ 辽兴宗时，由于辽朝在边疆推行屯田政策，使东北和西北边区的农耕进一步开发。约在重熙十年（1041）前后，因“西蕃来侵”，为“守御计”，兴宗命耶律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耶律唐古先屯“田于胪朐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今乌兰巴托西）”，直到道宗即位之初，已连续丰收了“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辽代，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确已得到广泛的开发，正如《辽史》所说，当时在辽朝境内，已出现了一派“城郭相望，田野益辟”^⑦ 的兴旺景象。因此，辽朝对我国北方和东北古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手工业发展：辽代的手工业范围很广，有些门类的手工业制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多年来各地出土的辽代文物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仅谈冶铁业。辽代的冶铁业比较发达，铁州是辽代冶铁基地之一，辽代的铁州就是今天的辽宁鞍山。^⑧ 辽

代铁州的铁矿最初冶炼者，就是契丹曷术部的奴隶。《辽史·营卫志》载：“曷术部，初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曷术’，铁也，以治于海滨柳濕河、三黜古斯、手山。”这里所说的手山，就是鞍山的首山。

辽代对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虽是各族人民共同建树的丰功伟绩，但与辽朝的政策措施也是分不开的。宋朝的余靖曾说：“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②

四、促进民族融合和沟通东西交通

（一）促进民族融合：辽金时代是继北魏以来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当时，由于契丹等族的南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北移，其结果就造成民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种民族杂居，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另外，辽朝在北方政治上的统一，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便于互相了解和学习。在北方各族中，汉族的文明较高，由于汉族和其他各族长期共处，因而汉语也就成为各族相互交往中通行的语言。如许亢宗在宣和六年（1124）使金，行至黄龙府（吉林农安）一带，他说：这里原是“契丹东塞。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骊）、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证，方能辨之。”^③各族之间通过接触和交往，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族的先进文化，在这种互相交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统治者害怕这种融合，从辽太祖时起，就制定专“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⑩企图以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维护其民族特权，但终究阻挡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辽代有不少契丹贵族都起有汉名，乃至圣宗时曾诏令“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⑪辽圣宗还倾慕汉族文明，留心翰墨，提倡吟诗，校讎儒家经典，成为一时风尚。兴宗以后进一步汉化。辽道宗曾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⑫到了辽末，“契丹、汉人久为一家”，^⑬可见这时的契丹人和汉人已基本上融合了。

正因辽代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所以金、元时期，“汉人”一词的内涵就大不相同。清人赵翼指出：“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⑭就是说在金朝，把原辽朝统治下的各族人，统称为汉人。元朝在四种人的划分中，又把原金朝统治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等统称为“汉人”。由此可见，辽金时代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时不少北方各族都融合于汉族之中。

随着民族融合，金继辽朝，不断开发和巩固我国北部疆土，使东北大部分地区，自“辽金崛起，遂为内地”，^⑮使东北更边远的地区与中原连成不可分割的血肉一体。由此不难看出，自辽朝以来的民族融合，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了。

(二) 沟通东西交通：辽与北宋时期，隔绝了宋朝同西域的联系，大大削弱了宋与西方的陆上交通。辽同高丽为邻，也切断了宋与高丽的陆上道路。辽朝地域广阔，势力强大，南抗宋朝，西挟西夏，控制了北方，因而保持着与西域、中亚、大食、波斯等地区以及东方的高丽、日本等国的交通，继续进行中国与上述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辽朝的繁荣和强盛，也吸引着